

位於全球化十字路口的澳門： 歷史過程、社會變遷以及學術研究

蘇一揚*

近來，澳門社會動態不僅僅反映在發展方面，而且顯得越來越複雜。數個因素給澳門蓬勃的經濟發展打上了標記。它們越來越擴大，而且性質越來越特殊。澳門特別行政區目前已經在世界上獲得了一定的影響，例如，“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地獲得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確定的“世界文化遺產”資格。同時，一些社會運動出現公開化。最近發生的事件之一便是5月1日的遊行。5月1日作為國際勞動節，永遠是在慶祝和許多訴求的氛圍中度過。這反映了幾個世紀以來，資本與勞動之間的衝突與互補性。對澳門的此次事件，許多協會以及勞工領導人，紛紛在媒體上發表聲明，甚至街頭巷尾都在議論這件事情。於是，出現了一種間接的趨勢，將責任自然指向本地政府的各個機構。儘管如此，從總體上和在許多專業領域，政府的傾向和慣例仍然是逐漸地，但是非常有成效地針對一個非常複雜的過程。首先是政治、社會及經濟過渡。它面臨的問題是後殖民主義的情況。其次，它們確立了澳門在無可回避的全球經濟交流過程中的通道。似乎某些社會階層對於澳門社會及經濟的目前和未來的動態還有些不太瞭解，對它那些紛然複雜的問題也不是很瞭解。對於這些跨學科的問題，社會科學界有義務進行更多的學術研究，發表成果並提高學術探討的水平。

澳門社會變遷的動因可以反映在三個方面：1.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的更新；2.在與葡萄牙前殖民地國家非常不同的背景下，進行了一個堪稱楷模的政治過渡；3.澳門現在所面臨的十字路口是如何適應並利用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嚴格而言，從社會科學角度作出的初步評判，應該強調目前的澳門社會的管理及經濟政策獲得了很大成功。它們體現在全球性多邊交流當中。從歷史上來講，它們保持了澳門這一

* 葡萄牙文化博士（1993年）、歷史副教授資格考試（1999年）及澳門歐洲研究學會客座教授。

地區的特性。也許這是澳門在加入一個全球化過程中，可以援引的最重要的因素。它導致了無論是在全世界經濟相互關係方面，還是在內部分工的傳統方式方面，也就是說勞動資本與資源的變化方面所同時存在著的勝者與敗者。在此方面，尤為顯得重要的是，澳門經濟已經融入地區的網路，它吸引並繼續由中華人民共和國蓬勃的經濟發展而給它帶來的某種地位和重要角色。在政治及社會方面，澳門有了更加專門的參與。這最後一因素，還表現出全球化的過程，使得至目前為止企圖佔主導地位的西方角色慢慢也要依靠處於全球化多邊經濟交流中的重要的亞洲經濟，尤其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印度。

澳門不可以，也不應該“逃避”這些變化。自然這些變化會帶來挑戰，但是也帶來了一系列機會。澳門似乎現在已經從中獲得了一些好處，從其博彩業的逐漸全球化及利用其本身獨特的文化特徵，將其改變成新的產業和新的消費，來促進十分有限的當地需求。作為一種明確的指導思想而言，澳門的社會及經濟，現在不僅僅靠它的本地化，而且也迫使它在全球化方面進行重大的投資。這會產生明顯的社會及經濟影響，從城市化的社會概念到與一個更加相互依賴和全球化的市場的競爭力與要求緊密相聯的新產業產生，還包括其勞動形式，甚至其傳統團結的社會專業形式不可避免的發生變化。

全球化：學術研究無法避免

因此，我們必須記住的是，在最近的十年裏，有一個聲名大噪的詞成為了家喻戶曉的談資，也成為了全世界的議題。它試圖總結全球經濟及交流的變化，其中涉及人員的融合及排斥，資本財產與資訊的融合及排斥。全球化這個詞現在已經深入我們的日常生活。在媒體及政治演說中，在社會分析和越來越激烈的經濟界及金融界，已經成為經常不斷使用的字眼。¹ 在眾多的談話中，已無歷史，似乎亦無過去。全球化現在成為了一個眾人的想法，它已不再具有那種強烈的民族

1. BHAGWATI, Jagdish 《捍衛全球化》，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

性，同時，它也已經脫離了其歷史背景，無法再解釋它的“家譜”及其在時空中的運用。² 全球化這個詞現在已經使用得很濫，而且已經無法對其進行概念的限定。全球化的概念已經包括了各種自相矛盾的原因解釋。有時用它來解釋一系列不景氣的經濟形勢，有時候則用它來解釋政府和官僚機構的無能和低能，此外，還用它來表達一些社會團體和社會階層的要求，因為它們的傳統作用已經不能有效地融入一個越來越全球化的經濟。說起來又奇怪又簡單，幾乎所有的講法企圖把全球化變作一種“世人皆知”的話題，而不援引其他的解釋。一再強調它在全世界範圍內的新穎性，然而在許多情況下，在許多交流中，它實際上具有一個很長的歷史過程。其斷斷續續地促進或者限制某地及某國在全球化過程當中的空間的活動。的確，全球化是一個非常漫長的歷史過程或歷史過程之一，它塑造了我們所處的時間、空間和文化。同樣，脫離時間和空間來談論全球化也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為不能理解，也不能解釋為何現在動輒使用全球化這個字眼，原因是這個字眼之外還包括了一個“西方文化”，作為一種真正的理性，被接受的傳統過程。它具有永遠進步和良好的性質，永遠地與現代化結合在一起。如果對其進行廣泛的學術研究，那是對此種開明的樂觀的批評，而這種態度總是包含著西方進步及理性的諸多想法，然而它卻受到了“新少數人”運動環境的挑戰。不幸地是，這方面的嚴肅研究為數不多，它們沒有能夠真正地寫出一部全球化的歷史，沒有探查到其歷史的所有過程，亦未找到為什麼這個詞今天成為了我們這個新聞發達的虛擬世界的重點辭彙。可以說，澳門歷史，在世界和區域化市場的十字路口上，充滿了多邊的活動。澳門的歷史，如同我們將看到的那樣，可以是一個進行研究、討論和提出新看法的基本實驗室。首先，我們從全球化的概念及方法開始，而不去大談特談它的“新穎性”，以突出其歷史過程，決定性地將這一個被炒作的詞彙變成對一個企圖進行內部複雜過程的結構性及推廣過程的嚴肅學術研究。

2. 蘇一揚《殖民主義，世界經濟及全球化：過程與史學討論》。載於《撒哈拉以南非洲：全球化及地方背景》。波爾圖：波爾圖大學文學院，2002；蘇一揚《亞洲與歐洲在世界經濟形成及全球化過程中的作用：過程與史學討論》，澳門文化雜誌，9 (2004)。

全球化重新定向

經濟、政治及社會學術研究，對全球化有著不同的定義，往往強調的意義遠非是那些具有共識的定義。³ 一個通常的分類認為，全球化的基本概念是世界經濟及市場融合成為一個大的體系。從此觀點而言，全球化是一種歷史不久的經濟融合。它產生於19世紀與20世紀交替之際。當時歐洲列強之間的相互依賴，以及它們的殖民地構成了不同經濟結構生存的根基。⁴ 因此，根據其當代的意義，在許多世界通史手冊中，尤其是以美國為主的英語地區的手冊裏，在它們的《世界歷史》的最後篇章中，都會大談特談這個詞，告訴人們當前的經濟及政治關係基於市場經濟及民主機構這一對不可分割的辯證關係之上。⁵ 從為政治家及經濟學家經常使用的觀點來看，全球化的概念有一個雙重的技術及政治意義。首先，它是經濟與政治經濟研究的最佳領域，可以為國與國之間貿易的發展進行實用性研究。這種貿易是以全球性的機構為基礎的，它允許不同政治地區的私人和企業交換投資、資金及產品，並將限制降低到最低水準。

這種看法，從歷史上來講，與“自由化”這個詞不謀而合，將經濟自由的理論，即“放開干”那句老話同阻止經濟與金融活動的障礙的不斷消失結合起來。⁶ 這一特性的形成使得目前全球化的起源來自於19世紀西方的自由化。19世紀的自由化，實際上是一種早期的全球化，保證了大不列顛的盛世，再加上以對殖民地原材料的剝削為基礎的工業化造成的全世界資本的流通。從此角度來觀照這個全球化過程，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兩次世界大戰以後形成了一種動向或稱其為“全球化時代”，⁷ 其圍繞的中心是一種以“新自由主義”為主的經濟思想。它的

3. ROSENBERG, Justin 《全球理論之愚》。 London: Verso, 2001.

4. KENWOOD, A.G. & LOUGHEED, A.L. 《國際經濟的成長》。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5. HELD, D. 《民主與全球秩序》。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6. HALL, John A. 《強權與自由：西方崛起的因果》。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5.

7. FEINSTEIN, Charles; TEMIN, Peter & TONIOLO, Gianni 《兩次大戰之間的歐洲經濟》。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論據是，在一個建立在關稅率、利潤和浮動匯率的世界化過程中，如果某個國家的經濟政策仍然依賴於保護主義的條款來保護它們本國的市場，是不合時宜的，因此得出的結論是，必須要保持一種完全的經濟獨立及具有很強的國家性質的貨幣政策。⁸現在全球化已經成為了一種設立機構和達成全球化協定的過程，它能夠排除一切阻止貿易自由的障礙。這實際上是在成立了國際貿易組織的烏拉圭回合達到的目標。它可為這種不同的貿易利益的糾紛仲裁，同時可以通過，諸如歐洲馬斯垂克條約的方式來擴大它的範圍，還有北美自由貿易協定。就此目前世界政治及國際關係領域的主流前景而言，全球化勢必推動和方便世界經濟及金融活動，進一步發展投資、跨國企業、技術、基礎設施以及全球性機構。通過這些做法，最後可以確立相當一批經濟及貿易活動：國際貿易發展的利潤率可以超過世界經濟的增長率；資本活動的擴張包括在周圍國家直接外國投資的提高，資訊的世界化，使用國際互聯網，電話聯繫以及衛星聯繫來加速經濟活動與機會，文化及旅遊業的發展，例如像好萊塢和實萊塢那樣大量出口影片，全球金融系統的發展，跨國公司的發展及“各種”技能的發展。這進一步調動了國際組織，從著作權到發明權，對生產及貿易採用新的法律保護形式。這些特性將最後為經濟原因提供可靠的論據，並為全球化提供支持目前這一理論的體系。主要是圍繞相對優勢並宣稱世界自由貿易的原則可以更加有效地使資源本地化並產生效益，帶來積極的效果。這不僅僅體現在經濟發展方面，而且體現在社會發展方面，可以增加投資的機會，創造就業，提高個人素質，科技設備以及社會基礎設施。

儘管如今獲得這些優勢是可行的，然而眾所周知的是，要反證性地援引一系列的文獻，而且要有大量的政治活動及政治干涉才可以反對這種良性的全球化價值觀。這種做法可能導致出現一系列的損失和困難：逐漸的恐怖主義的世界化；產生許多新的國際犯罪形式；非法移民的猛烈增長；工業化北方的邊緣地區的貧困及失業的加劇；各個民族國家主權的不斷被侵蝕；現在越來越一致的全球性多元文化導致

8. EICHENGREEN, Barry 《資本全球化：國際貨幣制度史》。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

了文化多樣性的減少，造成了許多語言、方言及“傳統”文化的消失。無論是從那些美化全球化好處的角度來看，還是從對它批評擴大的角度來看，要對全球化作出一個概念分類，看來已經是當務之急了。同時還要看到它所帶來的不同過程和問題。從歷史上來講，它總是根據不同社會，不同文化和不同的政治形式而找到了不同的解決方法。總而言之，對於全球化的研究仍然不多。它是一個歷史過程，也是一種社會變遷，它使人們做出了許多自相矛盾，過於簡單和不明不白的解釋，例如，有人認為世界越來越相互聯繫，越來越國際化，越來越制約了國家的主權，同時，也有很多民族主義的運動和反對派。它們甚至企圖在東歐和在巴爾幹半島重新劃分歐洲的政治地圖。

另外一種對全球化概念的定義企圖擴大構成這一全球化動因的研究。它強調了一種全球性的人口、產品、服務、資本、資訊及文化的漫長交叉及流通的過程。一些作者、著作以及某些(佔少數的)歷史學家贊同這種漫長過程的看法，並企圖將全球化解釋為一種曾經在時空造成了人口、經濟及文化活動的歷史過程。它在交流和目前社會的結構方面，產生了逐漸普及的影響和適從。因此，全球化的歷史不僅僅是一種描述歐洲黃金時代老歷史的新形式，⁹它要迫使人們重建中國、印度、東南亞，還有非洲及穆斯林世界，歐洲、美洲在推動越來越全球化的總體關係過程中的作用。不能夠將這種關係僅僅追溯到19世紀或追溯到“大發現時代”，其淵源更遠久。對這一更深刻的淵源的研究必須通過對不同物件及工具的社會、經濟和文化流通、傳播及改造的研究，不僅僅是資本，條約和工業生產，我們不應該忘記那些近幾年來針對不同殖民主義背景中流行的病症而發表那些優秀的著作：¹⁰那些關於食品，例如土豆、咖啡、番茄、茶和辣椒廣泛傳播的著作。它們也同樣走遍了全世界，於是進入了大部分當代人每天的食譜中，同時，還要經常閱讀那些詳細分析了思維和科技傳播的著作，尤其是強

9. JONES, Eric L.《歐洲之奇蹟：歐洲和亞洲歷史上的環境、經濟和地緣政治》。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LANDES, David《國家財富與貧窮：為何有富有貧》。New York：Norton，1998。

10. DAVIS, Mike《熱帶種族滅絕。自然災害與殖民地飢荒所導致的不發展》。Paris：La Découverte，2003。

調了相互關聯，而不是那些徒勞尋求某種中心主義，尤其是以歐洲中心主義為主的著作。

根據某些歷史學家，經濟學家和其他社會科學家近年的研究顯示，歐洲在世界現代經濟關係史上佔主要作用的“發明”說逐漸被破除了。¹¹ 從歷史的角度而言，特別是從五千年來便產生了一種制約全球化關係的連續的世界體系，而並不僅僅是像大部分資本主義歷史和世界經濟歷史題目的理論家認為的是，最近五百年前才形成的。¹² 目前資本的積累，貿易以及增長在歐洲現代之前並在西方之外業已存在。的確，那種世界性體系並不產生於1500年，它不是從歐洲冒出來的，更不是純粹的資本主義的。¹³ 現在有可能找到線索和資料來明確地證明一種世界體系當時的中心是在印度和中國。無論是在現代化前時代，還是在歐洲前時代，它限制了其他亞洲經濟體系的興起和衰敗。可以證明，各種動因是從這一體系分佈至其不同的組成部分。這些全球化的研究企圖徹底批判那種物質論的看法，即過分地強調世界的歐洲中心論，將歷史看作僅僅是一系列社會與經濟變化階段的綜合，同時，對照性地強調，世界經濟史是圍繞競爭日益激烈的世界市場的不同方式的壓力和要求而形成的。貿易及資本的積累是建立在世界貿易的基礎之上的，它從來便是全球經濟的組成部分。由於供求關係所帶來的競爭壓力構成了政治經濟變化的微觀體系的形成。世界經濟史的這一週期性要求人們放棄一種單邊的立場，即贊同1492年由於哥倫布抵達了安地列斯群島而發生了一種質變，及由此而產生的世界經濟體系是圍繞歐洲資本主義中心而展開的。

因此，必須重新審視世界經濟體系形成的歷史：¹⁴ 一種全球性的歷史看法對於進一步研究宏觀的世界歷史變化具有基本的意義，研究

-
11. WALLERSTEIN, Immanuel 《現代世界體系。資本主義式農業與十六世紀歐洲世界經濟的起源》。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4.
 12. ABU-LUGHOD, Janet L. 《歐洲霸權之前。1250-1350年間的世界秩序》。New York -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13. FRANK, Andre Gunder & B. K. Gills (eds.) 《世界秩序：五百或五千年?》。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14. FRANK, Andre Gunder, 《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陸地帝國的黃金時代及其衰落，從工業革命到“東方”的衰落，到“西方”的發展，其中還包括在非洲、亞洲，或在南北美洲的殖民主義的研究。從總體上來講，全部、全體永遠大於每個部分的和，而通過每個部分的加數，才能夠瞭解它的全體，如果我們採取一種全球化的看法，並不意味著產生了一種認識論的轉變，這不是很容易實現的，原因是大部分的社會學作品仍然受制於傳播廣泛，而且作為世界被廣泛認可的正式學術所引用的歐洲中心主義意識形態的影響。相反，從不斷進行的科研積累可以逐漸察覺到，亞洲，尤其是中國明清兩朝以及印度莫臥爾王朝的主導作用。在1400至1800年期間，他們是世界經濟的心臟部分。同時，應該認識到，在這一時期，歐洲在全球性的生產及貿易當中，仍然是一個不太合格的邊緣性的“運動員”。¹⁵ 歐洲直至18世紀末，面對亞洲的生產及擴張來講，在全世界經濟範圍內，仍然落伍在後。當時有一系列的原因，可以列舉對世界經濟貿易到對美洲白銀及黃金的擁有，還有其他一些殖民剝削的形式推動了歐洲的經濟，使其在工業能力方面超過了東方，然而，從內部方面來講，沒有甚麼特別的地方，尤其是從歐洲的內部來講，有工業革命現代國家的產生或歐洲經濟資本主義的重新組合，這一系列因素將歐洲推向了這一頂點，但其基礎還是以整個世界經濟的週期變化為基礎的，只是將這一週期累計起來並加入了它對其他殖民地的擁有和剝削。

西方在世界經濟史上中心地位的隆起在於一種知識體系，在於歐洲中心主義。歷史上便有其特性，而且它有著深刻的淵源，造成了物質主義權利和利益的形成。¹⁶ 某種歐洲中心主義的思想，從歷史上來講，賦予了西方一種幾乎是神聖般的歷史使命。其歷史命運卻是建立在不斷科技進步、理性、工業化及現代政治、社會及經濟機構之上的。這一思想將歐洲的經驗變成了一種普世經驗，將世界圍繞一個特

15. CHAUDURI, K. N.《歐洲之前的亞洲：從回教崛起至1750年的印度洋的經濟和文明》。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

16. BLAUT, J.M. 《世界的殖民模式。地理傳播理論與歐洲中心論的歷史》。New York-London：The Guilford Press，1993；BLAUT, J.M. 《世界殖民模式。八位歐洲中心論史學家》。New York-London：The Guilford Press，2000；SAID, Edward 《東方主義。西方的東方觀》。New York：Routledge，1978。

別的重點，即歐洲而運行。從此開始，世界便兩極分化成“西方”與“其餘”（或許用英文的“the West” and “the Rest”表達力更強）。它創造了一種雙極的知識體系。在這一體系當中，歐洲總是居高臨下，而且具有指導和主導的性質：西方國家與“原始部落”，西方宗教與“迷信”，西方資本主義與傳統的生存經濟，西方科技與手工藝，西方進步與停滯或落後……因此，對歐洲發展和勃興的一般解釋，以及對世界體系所發生的變化，應該進行徹底的重新審視。應該強調的是，世界體系的變化有一個動因，其中心位於亞洲。它在人類歷史近代的初期，對歐洲的經濟及機構的變化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因此，這一東方和西方位置的改變將帶來由目前世界體系所提供的財富分配位置的變換。

澳門，一份全球化歷史的“禮物”？

這一學術的重新審視也開始出現在某些研究之中，尤其是中國學者的研究中。他們現在已經開始以新的題目和新的方式來研究澳門的歷史及其現實。中國歷史學家及研究人員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來拓展葡萄牙學術及殖民歷史所留下的小巷。¹⁷ 從殖民史學的角度來講，對澳門的解釋已經有了一批主流看法，認為葡萄牙人有特殊的適應熱帶社會的能力，形成了“不同種族”的社會及其無法比擬的“柔性”殖民主義體系。過分強調於需要有正式的文獻，重事實輕過程，殖民記憶的地方，從名到實，從“發現”到“天才性”。整個殖民歷史文化不僅僅展示了一個非常狹窄的科研範圍，而且其專門性也十分有限。如果我們想涉及澳門過去運作的基本結構性指數，即便下很大努力進行書目研究，其結果也是非常令人難過的。嚴格而論，我們對於澳門的經濟歷史有多少了解？知之甚少。對於其結構組織及整體組織不甚了解。這裡，在歷史上曾經有過多種貨幣系統流通過，有過不同的重量及度量衡體系，我們知之甚少。更廣泛而言，我們對澳門本身的結構，及澳門經濟歷史的意義有何嚴格的學術了解？除了那些空泛而基本的評述

17. 參見霍啟昌《澳門模式》，Hawaii：University of Hawaii，1978 (Ph.D. dissertation, pol.)及吳志良《生存之道》，澳門成人教育學會，1999等著作。

外，幾乎是眾口一聲地強調其經濟週期，受制於某些貨物的貿易及交換。就受到某些政治和商業精英所控制的交換而言，他們與其說是坐商，還不如說是行商。他們認為具有“葡萄牙性”，但未從這個系統的角度來解釋流動資本與固定資本的流通，無法解釋金融結構的投資體系，經濟組織方式。還有很多題目需要研究，主要是經濟結構及社會的分工。或是說，在澳門這個地方，在其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沒有人靠勞動而活，只是等待著從“天上掉下來”那些貿易的厚利，還有那些在澳門修建馬路和樓房的工人，那些修鞋補衣的工人，或者那些修建天主教教堂，為其包金和裝飾的工人？這些工人從哪裏來？這些工人的工資如何？誰支付？他們的社會及文化背景如何？僅僅靠他們的勞動是否能夠生存？如果我們再多問一些這樣的問題的話，即便不是想問更詳細的問題，在澳門社會史方面還是有很多的疑問，而這些疑問在目前的史學中，尚未有答案。他們的親屬關係，家庭單位及其方式，在澳門歷史上曾經採取了哪些形式？可以區分出哪些社會團體和階層？婦女的社會作用及議院組織形式如何？對於這些基本的問題，仍然未有答案，因為仍然沒有在某些成說之外的研究成果。這些主流研究一再強調多元文化的看法，“文化融合”。這些都已經彙編成集或以文集的方式出版。其中的某些提法是“不言而喻”的。總而言之，是為這些根深蒂固的成說尋找“證據”或“解釋”，而這些成說沒有(很好)看到社會經濟和政治及澳門過去的複雜性，也沒有看到澳門政權的表現形式，以及主權控制形式長期的談判過程。

貿易流通，然後是葡萄牙在澳門的殖民存在，實際上是中國的不斷“恩賜”。在世界經濟交流的歷史過程中，起到了明顯的中介作用。如同所有恩賜的情況，“禮物”要求有所回饋，於是便組成了一個談判、共識和結盟的漫長網絡。進入19世紀以後，葡萄牙人的政治、經濟及社會方面的流動，以及某些歐-亞親緣結構的形成受到了廣州和北京的嚴密監視，並引起了他們的注意。許多中國重要領導人認為葡萄牙人在珠江口這一小地方的活動是必須加以剷除的“南方一痛也”¹⁸，但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共識系統使得葡萄牙人享有某種政治和行政自

18. 霍啟昌——葡萄牙人居澳研究。Lisboa：Gradiva，1996。

主，在澳門生存了下來。他們為在亞洲各國之間及全世界經濟交流過程中，尋求豪華的中國產品所驅動。的確，除了16世紀下半世紀及17世紀前幾十年同日本白銀交易這一賺錢的“周期”之外，澳門是作為一“特”區頑強生存下來的，以振興同東南亞、印度及同歐洲社會精英的貿易的能力而博弈。當時他們所尋求的是中國的絲綢和其他的奢侈品。因此，這一漫長過程所留下的遺產仍然體現在目前澳門的經濟及社會當中。它以其多元性為基礎，不僅僅是那種東西方橋樑的固定形象，而且更進一步而說，通過澳門的協調、組織和投資的能力，形成一種中國豪華產品多方傳播的渠道。只要這些中國產品（從絲綢到茶葉）一旦短缺，澳門的社會及政治困難便會接踵而至，便會導致產生了單一結構的殖民貿易，例如17和18世紀出現的女奴貿易或給19世紀的中國社會帶來了負面影響的鴉片走私。只要澳門的流通和應變世界經濟挑戰的能力受到限制，便會失去了其社會的動力和經濟發展的速度。

澳門的“特殊”生存之道之上，還有其多方活動的能力。這是它的另外一個歷史遺產。在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中，慢慢形成了一種面對中國的政治、經濟和社會要求而產生的內外共識的結構。這一共識逐漸導致了許多政治模式，例如如今仍然反映在回歸中華人民共和國時談判得到的典型地位，也逐漸產生了許多隨遇而安的形式和一般都是以對通過澳門扮演的由外部的政治與經濟刺激而形成的變遷。這種“歷史性的共識”甚至還形成了第三種澳門歷史所特有的標記。它不僅僅成為了東西方之間的橋樑，同時它還是歐洲貿易與中國工業經濟之間交流的最佳渠道。直至19世紀初，中國的人口、工業、能源、農業指數在歐洲經濟範圍內仍不多見。¹⁹ 其人口——經濟結構現在可能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繼往開來，進行重新組合和發展。

第四個遺產也帶有明顯的歷史性。它遠非一種近來的“發明”。它具有一種幾百年的國際經濟動因。它是通過對中國產品的貿易，對其勞動力的利用，尋求新的能力資源和新的特殊經濟作用來實現的。在博彩休閒業或文物及旅遊方面目前所做的努力是這一動因和特殊性雙

19. POMERANZ, Kenneth - 大分岔。Princeton-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WONG, R. Bin - 巨變後的中國。歷史轉變與歐洲經驗的極限。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重遺產的更新。澳門的特殊生存，在歷史的長河中，具有不斷的地區性融合和拓展全球化的雙重特點，這要求澳門發揚光大這四項使其不斷參與了全球化歷史的遺產，同時還要求它在目前更有優勢的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情況下，進一步更新它的歷史作用。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在政治過渡及經濟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績和高度成就，使它已經不需要僅僅運用那些使澳門獲得“特殊”本地化的“可控制”的辦法，而且可以通過其多元文化、共識、仲介和動力來迎接全球化擴大過程給澳門社會，澳門的企業家和員工，及所有的工作人員、官員，及進一步提高其為數眾多的年輕人的素質培養提出的新挑戰。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通過其巨大的經濟發展努力，已經成為全球化過程當中最基本的成員之一時，這些遺產具有更現實的意義。如同這一過程當中的其他的主角一樣，中國在未來的數年中，將被迫保持聯盟，進出口渠道，對市場和資源的擁有，以保護它的穩定，進一步鞏固它的發展。對澳門而言，這不是一種競爭困難，更不是一種尷尬的局面，相反，這是給澳門的新“禮物”，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一特區找到一些新的多邊活動的渠道，專門作用，動力及共識。這便是澳門歷史生存的基本標誌。對新的空間，市場及葡語國家資源的擁有，同東南亞國家歷史交流的便利，同朝鮮半島及日本的便捷交通，以及通過葡萄牙同歐洲較多的聯繫，這些再加上散居在世界各洲的澳門僑民應該幫助保證這些多方面的渠道的擴展。離開了這些，澳門的特殊生存和發展能力將受到基本限制。這些對全球化的適應及互動必行之路帶來了巨大而複雜的任務，也帶來了它的優勢。同時，也不可避免地帶來邊緣化的損失。這要求更新另外一種遺產，即在澳門漫長的歷史上已經建立起的一種共識的社會。此乃當務之急。澳門社會需要一種全面的共識，需要投資，需要進一步推動專業及有創新的學術研究。捨此，社會變遷將變得不可理喻，全球化所帶來的挑戰和提供的機會將無法利用。如果更不客氣地說，所得到的“禮物”將會浪費。